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3—4辑合刊

1986

总第45—46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6年第3—4辑合刊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339,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600

书号17001·146 定价2.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6 年第 3—4 辑合刊目录

(总第 45—46 辑)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文献

革命的西班牙 卡·马克思 (2)
岑 川译

1857—1863 年间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学说的发展 [民主德国] 巴尔巴拉·利茨 (16)
王燕华译

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产阶

级货币数量论和国际金银流动理论的批判 高德文 (40)

马克思《资本论》中“使用价值”范畴的发展

过程 [苏] P·齐亚勃留克 (51)
晓 鸣译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矛盾的性质和

特点 [保] 日·阿罗约 (68)
迪 平译

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日] 水田洋 (79)
郝立新 荣 剑译

社会经济形态 [苏] M·A·谢列兹尼奥夫 (89)
小英译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发表一百二

十周年 [民主德国] 罗·德卢贝克 (102)
魏升译 胡慧琴译

关于弗·恩格斯的文章《行动中的团结宁
主义者》(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

历史) [苏] H. M. 皮鲁茨娃 (120)
刘怀璋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问题 [苏] M. 罗特斯 (137)
刘怀璋 朱逢森译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的历史

背景 [苏] B. C. 涅瓦林娜 Ф. И. 菲尔索夫 (157)
刘燕明译

从俄国的国家杜马问题看布尔什维克策略的

变化 郭值京 (169)

文献和资料

威廉·李卜克内西给弗·恩格斯的二十三

封信 刘聘贤译 (182)

恩格斯在普鲁士秘密警察

监视中 [苏] 波·格·塔斯纳 肖彬译 (207)

研究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参考资料

狄慈根的哲学与现代实证论

(第三章) [德] 奥·伊·格尔方德 (220)
谭金云译

我们的目的(二) [德] 奥·倍倍尔 (237)
蒋仁祥译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文献 任建华译 (26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263)

同列宁学校毕业生座谈纪要 (265)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捷克斯洛伐克

问题所作的发言摘要 (267)

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269)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270)

传记和回忆

耶森市长谈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 兵译 (273)

欧仁·杜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摘译) [苏]И. А. 巴赫
蒯启发译 (276)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关于阿尔都塞的《亚眠的答辩》 顾 良 (286)

亚眠的答辩 [法]路易·阿尔都塞
顾 良译 (291)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评介(五)

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志尚 (327)

边际效用价值论能否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评庞巴维克《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之二 丛 明 (343)

评介和文摘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新

版本(摘译) [苏]B·布鲁什林斯基
晓 鸣译 (362)

苏联对马克思数学手稿进行整理、研究

和出版的一些情况 陈国雄 (373)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 [苏]Ю·B·米卡泽
小 文译 (376)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人物简介的编写 刘方清 (380)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1986年

(第19—46辑)目录 (384)

致读者 (418)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文献

1854年8月至11月,马克思为美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文章。该报在1854年9—10月发表了论述西班牙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开始的六篇文章,而且编辑部将其中两篇分截开,这样一来,报上发表的这组文章就不是六篇而成了八篇。^①

马克思的这组文章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国历史的范围,有助于了解世界历史的若干一般问题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规律性。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是这组文章中新发现的一篇(按马克思的编号应为第七篇),马克思在这里继续叙述了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前几篇文章中谈到的革命,就其发展的规律性作了分析,从而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了由西班牙历史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该国革命和反革命的特点。

马克思在1854年11月21日写的下一篇文章(照他的编号是第八篇)则评述了以后的事态发展,即1823年4月7日法军按照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的决定对西班牙的入侵。马克思在最后一篇(照他的编号是第九篇)文章里分析了第二次革命的原因。这两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

现在发表的这篇文章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二部分第十四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并根据该院得到的1855年3月23日《纽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53—511页。

约每日论坛报》的复印件发表。它的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十五卷。

下面的译文是根据《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5年第3期的俄译文翻译的。

革命的西班牙

卡·马克思

(第九篇)^②

德·沙多勃利昂先生在他的《维罗那会议》中责难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说它不过是穿着加斯梯里亚服装在马德里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一出盲目模仿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丑剧。¹他忘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文明过渡的各个民族的斗争只能在某些特点上有所不同，而这些特点是由发生斗争的那个地方特有的种族、民族、语言、服装和风俗所决定的。他的责难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愚蠢的老太婆，她固执地猜想所有热恋中的少女都在模仿青春年华时的她。

已经写出了大量著作，它们赞成或反对1812年的宪法。²1820年宣布恢复这部宪法，开始了旧社会及其利益和偏见同新社会及其需要和愿望之间的三年斗争。1812年宪法明显地打上了实际行不通的印记，而这也是现代民族在其精神复兴时期制定的所有宪章的共同特点。在这类宪章借以产生的革命时代，它们所以不能实现，不是由于其中某一个条款行不通，而纯粹是由于它们的立宪性质所造成的。在立宪时代，它们不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充满

^② 按照《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编号。

着与社会复兴过程开端不可分割的崇高幻想。例如，1791年的法国宪法当时被人们公正地视为反动的宪法，在1830年又被指责为雅各宾主义。³ 为什么呢？因为在1791年，王权及其所代表的旧社会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改变，因而不容许这些统治势力去同新社会的成员相互作用并在他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当时所必需的是用革命行动去摧毁旧社会的抵抗，而不是通过宪法确认同旧社会无法实现的妥协。相反，在有可能实行有限君主制的1830年，不言而喻，这种君主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解放。在1830年，1791年的宪法可能看起来象一个种下不和的时代错误。这些论据用于1812年西班牙宪法也仍然有效，但是1791年的法国和1820年的西班牙又有差别，1791年宪法只是两年革命进军的停顿，而1812年宪法则根本取代了革命。前一天还是东方专制政体⁴的西班牙，一夜之间成了以君主为首的立宪国家。这种突然的变迁只有在西班牙历史上才可能发生。和1814年一样，1823年又恢复了专制君主制，斐迪南七世⁵ 大笔一挥就勾销了在王位空缺的革命时期⁶ 所建树的一切。在革命者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854年西班牙人一开始就指向1843年被他们打下去的埃斯帕特罗⁷。1814年，斐迪南拒绝对卡迪斯宪法起誓，从而结束了这场革命。1820年革命一开始就迫使斐迪南对原来这部宪法起誓。他重新召集两年前被他解散的议会，并且任命那些在1814年受迫害和被关进监狱的人担任大臣。西班牙各派都同样固执地硬要在本国历史书中找出并非由他们自己写下的篇章。由此产生了这些突然的变化、这些非分的要求、这一连串无休止的抗争。由此还产生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这种只能加以摧毁，而决不可能削弱或动摇的顽强精神。

第一届宪法内阁可以说是以奥古斯丁·阿尔奎列斯先生为首的，这届内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由1814年的蒙难者⁸组成的。这些蒙难者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危险的。他们意识到过去的挫折，因而精神空虚。他们失去勇气，喜欢过分夸大自己的功绩，尤其想

强调自己的英明。一掌握政权，他们就想宣布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大概，他们复归的事实本身使他们具有革命的帝王复辟主义者或是帝王复辟主义革命者的特色。他们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嫉妒对待那些新人，因为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些人是竞争对手。他们时而害怕反革命，时而忧伤地预感到无政府主义将临。环境本身的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与前者妥协，为的是让后者怕他们，为了不看到真正的进步界限（象他们习惯于定名那样）被破坏。阿尔奎列斯内阁就是这样。从它组成到议会召开的四个月期间，政权实际上不存在。在外省和首都都有各式各样的团体在活动；支持秘密社团的人民俱乐部也在活动；⁹第一次出现了自由通俗的刊物；人们入迷地大声读着请愿书；爱国主义的歌曲广泛流传；为纪念宪法树立起了种种纪念碑；组织了充满激情的示威游行，这种激情对于重新获得自由的人民来说是很自然的。同时没有一条报复的法令，没有任何犯罪，到处是对容易忘我地表达自己感情的南方人的热烈气质表现出意外的宽宏大量。

议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1820年7月9日召开了。塞维利亚大主教唐·霍赛·埃斯毕克被选为主席。斐迪南七世在议会就象这以前在地方自治机关¹⁰那样，对福音书起誓说他将遵守卡斯蒂宪法。国王宣称：“仅仅是一些过分的不公正的痛苦激起了人民明确表达出自己被抑制了如此长久的愿望，我急忙站到他们所指的路上，并发誓忠于1812年议会的宪法。从此国王和人民都有了自己的合法权力。我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¹¹斐迪南七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懦夫，一只怀着兔子胆的纸老虎，一个无能实施权力的权力贪图者，一个追逐专制权力以便转交给自己奴才的君主；然而他为自己的一种品德感到自豪，这就是最完善的伪善。他得到了一种独特的享受，在得胜的敌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同时又谋算在适当的时机一反誓约对他曾经蒙受的奇耻大辱进行报复。当他作为拿破仑的俘虏时，为提供给他的避难所而奴颜婢膝地感谢后者，¹²并请求他把波拿巴家族的一位公主嫁给自己。他同波

拿巴就恢复自己西班牙王位的问题进行了谈判，在一封卑躬屈节的信中宣布说，如果他对给自己戴皇冠的恩人忘恩负义，他将成为凡人中最卑鄙者，他的名字将在欧洲永远遭到唾弃；然而同时他却秘密地写信给马德里的摄政王，告诉说，他获得自由后将立即背叛法国皇帝¹³。1820年7月9日，当他又向宪法宣誓并宣称他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时，西班牙伯爵和庞斯先生已经以他的名义在巴黎与马松阁，也就是阿尔图尔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¹⁴及其一伙进行了谈判，目的是要推翻这部宪法。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例如，1823年9月30日当他颁布法令时，只是为了高兴而在最庄严的气氛中许下种种虚伪的诺言，同时又破坏这些诺言。¹⁵他把准备反革命的主要工作完全交给了旧制度的拥护者，并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却为自己保留了一项权利：一旦受挫则予以放弃，一旦失败则置他们于不顾。任何时候任何凡人都会毫无所动地经受他人的痛苦。而他这个人身居高位，满足于表现出自己对宪法的憎恶，把它变为取笑之物。于是，一天晚上他给内阁首脑送去一封信，通知说，他任命孔塔多尔将军为陆军大臣。大臣们在军队花名册中怎么也找不到将军的名字而无比惊诧。最后才知道，孔塔多尔以前曾经是一个骑兵连的连长，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且早已退役。大臣们羞辱地讥笑此事，纷纷提出辞职。斐迪南处理了这次事件，建议起用马丁涅斯·罗德里格斯将军以代替孔塔多尔，此人同他的前任一样也是一个无名之辈。又经过一番费事的查询才弄清，马丁涅斯在巴达霍斯¹⁶因火药桶爆炸头部受重伤之后，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斐迪南七世是一个集消极勇敢和积极怯懦这种技艺于一身的能工巧匠，尽管他自己习惯于对危险提出警惕，却从来也不担心引起灾难。

卡迪斯议会¹⁷代表、宪法的起草人和他们的拥护者组成了议会成员的大多数，而主张真正实施宪法的人则是少数。多数人认为宣布宪法是革命的完成，少数人则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前者确立了对政府的控制，后者只是想这样做；1812年自由派同1820年自由

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同革命激进派之间的分裂已是必不可免。如果说1812年的自由派在议会中的力量强一些，那么1820年的自由派则在俱乐部、报刊和街头握有比较巩固的阵地。如果说前者控制了政府，那么后者则以伊斯利军¹⁸为依靠，这支军队由于吸收了一些没有参加军事叛乱的团队而加强了实力，尽管基罗加¹⁹已作为代表被派到议会，它仍旧集结在安达鲁西亚省，受最高指挥部里埃哥指挥。为了消灭革命激进派的这一后盾，陆军大臣德·拉斯阿马利利亚斯解散了伊斯利军，在此之前借口任命里埃哥为加利西亚的总督，把他调离伊斯利军。伊斯利军这支在西班牙唯一能称得上是军队的军事力量刚被解散，在卡斯提利亚和西班牙北方立即出现了第一批“宗教匪帮”。²⁰

里埃哥接受自己拥护者的秘密召唤，于8月31日突然出现在马德里，在那里受到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和普遍的热情接待，政府则把这看成是真正的灾难，决定把里埃哥派到奥维耶多，伊斯利军的其他一些军官也被分发到不同的地方。虽然里埃哥并没有抵制这种非法的惩罚，大臣们却担心由于他夜里离开马德里而可能突然发生暴乱，于是调来了全副武装的首都警备队，在街上部署了炮兵。第二天奥古斯丁在议会中建议通过禁止人们集会的法令，建议得到托雷诺和马丁涅斯·德·拉·罗萨²¹的积极支持。这一天(1820年10月7日)应当认为是两个自由派公开决裂的一天，是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的开始。那种对恢复秩序的狂热渴望，那种对不断暴动的报怨，那种对人民激情的每一个表现的恼怒(它们的见证人是1848年革命后数星期里的欧洲)，现在控制了比利牛斯半岛上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

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820年11月9日结束的，带着自己的埃斯科里亚尔宫²²的忏悔牧师维克多·萨埃茨离群索居的斐迪南七世，认为正是“搜索”敌人的时候。他破坏宪法，以没有主要大臣签字的一纸国王旨令，任命卡尔巴哈尔将军为新卡斯提利亚省的总督和马德里市的卫戍司令，以取代维戈德特将军，但维戈德特将军

拒绝把自己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卡尔巴哈尔。内阁看来处于困境，现在转而向它已经开始迫害的政党进行呼吁。它把目光转向俱乐部的领导，异常诚恳地接受了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要求国王返回马德里的充满激情的请求。休会期间代表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警备队和警察全副武装，俱乐部实际上不停地召开会议，在国王住地的街上到处可以听到辱骂和恫吓声。报纸上每天公开宣传起义的思想，进军埃斯科里亚尔宫捉拿国王看来是不可避免了。斐迪南不得不屈服于这一风暴的压力，撤销自己的侮辱性的旨令，辞退自己的反自由派的忏悔牧师，带着全家于1820年11月21日回到马德里。他的返回使人想起了1789年10月6日路易十六被迫从凡尔赛回到巴黎。²³

内阁在1820年受到了自由派的拥护，这只是以一定的让步为代价；后来公开声明绝对拥护君主制的拉斯阿马里利亚斯侯爵被解除陆军大臣的职务，而伊斯利军的军官们则被提升。里埃哥被任命为阿拉贡省总督，米纳为加利西亚省总督，贝拉斯科为埃什特雷马杜拉省总督。²⁴蒙难者内阁动摇于对反动势力的惧怕和对五政府主义的担忧之间，竟然使自己的信誉在所有政党眼里同样都受到了损害。至于国王的一家和它的处境，正象一位坚定的帝王复辟主义者所写的，“由于不可能受到监视的保皇分子的过分热心，仍然是不得安定”。²⁵

在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期间（1821年3月1日），国王扮成一个地道的演说家。他不是简单地宣读内阁准备的发言，而是把它打乱，改变了它的行文，加进了更多的革命的词句，尖锐得多地叙述了发言中一些特别重要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的那一部分。²⁶一时大臣们甚至设想把他变成自己的同盟者，但斐迪南相当快地又使他们省悟过来。他以攻击自己的大臣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而大臣们则不能不忍受他的恫吓和侮辱；在政府表现出议会和宪法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毅力和勇气之后，这类情况也许不会发生。

国王的立宪演说是在大臣们辞职和内阁任命之前进行的。使所有国家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新制度的拥护者，没有一个在前政府中不享有专政拥护者名声的人。

新内阁首领M·费利乌过去是利马警察团的少尉和1812年议会的秘鲁代表，甚至在卡迪斯议会期间就曾以出卖灵魂和狡猾的阴谋家而闻名。外交事务大臣巴尔达希过去曾是外交官，与专制制度内阁的头目们有过密切的联系。进入内阁的还有曾经是卡斯提利亚省委员会的成员佩雷格林，他始终以自己对神圣联盟的忠诚而感到自豪。内阁在议会中已不可能指望有任何影响，它的被公开承认的目的是要“恢复秩序和镇压无政府主义”。²⁷这样一来，革命激进派又被解除了领导，全部权力归“奴才派”²⁸；一些重要的职位被委任给那些以自己对现行制度的仇恨而著称的人；比利牛斯半岛上保皇派的一切阴谋都被忘却了，而那些几乎被人民全部逮捕的阴谋制造者们，却被政府释放了。卡塔黑纳伯爵莫里略将军在这之前不久曾从西班牙领地回到卡塔黑纳，²⁹在那里，他以自己的残暴、专横、无耻，以及疯狂地进行了六年骨肉相残的战争而闻名。³⁰当回来的时候他在巴黎住了几天，参与了马松阁的阴谋；巴黎极端分子的报刊评论他是一个有能力恢复国王从前的特权并消除议会影响的人。他在马德里逗留期间，内阁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和爱戴，并任命他为马德里和全省武装部队的司令。显然，“奴才派”为了实现coup d'état^③正等待着这一任命。陆军准将唐·何塞·马丁涅斯·桑·马丁和莫里略联合起来。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复辟主义信念顽固的人，被任命为首都的jefe politico^④。如果说马德里由于莫里略这个名字而战战兢兢，那么卡塔卢尼亚和加利西亚就成了激烈冲突的舞台。在卡迪斯、塞维利亚和巴达霍斯爆发了真正的武装起义；暴动者拒绝吸收政府官吏，并且

③ 政变。

④ 总督。

提出只有解散内阁才执行国王的命令。在1821年11月25日咨文中,国王要求议会结束这场骚乱。在唐·何塞·马利亚·卡拉特拉瓦³¹拟定的答复中,议会谴责了在卡迪斯和塞维利亚的活动,但同时坚持要内阁辞职。因为这个内阁已失去了国家对它的信任和“领导国家的道义权力”。³²由于这项不信任提案,斐迪南在1822年3月1日新议会开幕之前仅仅四十八小时内就任命了新内阁³³。

这届议会选举的时间正是政府的反革命政策,以及有关奥地利为取消在那不勒斯宣布的西班牙宪法而进行武装干涉的消息和有关比利牛斯半岛各地“宗教匪帮”的掠夺性袭击的消息,使群众的积极性激化的时候;而这一切原因,自然使绝大多数人站到了1820年的被称作革命激进派的自由派一边。一位温和党的代表曾说:“新立法会议的压倒多数代表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³⁴他们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其余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军队中的平民阶层。关于他们与前辈们之间的区别,下述事实就可以证实:如果说他们把塞维利亚大主教选为自己的总统,那么前辈们提到的拉斯卡韦萨斯³⁵的英雄名字就是里埃哥·唐·拉斐尔·德。

新的内阁由过去的1820年议会代表组成,是马丁涅斯·德·拉·罗萨组建的。马丁涅斯·德·拉·罗萨摄取了外交事务大臣的职位,后来在天真的伊萨伯拉统治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³⁶他是1814年存在不久的马德里议会的代表,在反动时期受到了迫害;par excellence^⑤温和派,最高雅的西班牙诗人和散文作家之一;他始终是空论派³⁷基佐的忠实信徒。空论派先生们的温和包含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对群众的让步任何时候都不能带有过多的温和性。在保存尽可能多的滥用权力和旧制度的传统的情况下,自由派贵族的高升和最高权力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使她们欣喜若狂。他们找到了彬彬有礼的马丁涅斯·德·拉·罗萨,他受到一

⑤ 真正意义上的。

直是互相更替的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拉瓦尔·德·蒙莫朗西公爵和拉加尔德伯爵³⁸的奉承，他企图建立贵族院，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为下院和限制报刊制定财产资格，从而对1812年宪法作了一些修改。1834—1836年期间，这个不可救药的老顽固有幸看到了他的那部死在胎中的1822年宪法如何被执行，而后再如何遭到失败。法国的外交官使他了解到，土伊勒里宫³⁹似乎赞成实施一些类似法国的制度，而他本人则自我安慰地期望着国王不会拒绝接受类似使路易十八有可能为所欲为的宪章⁴⁰。国王自己则竭力讨好自信的温和派，并打算象后来弄清的那样，把他们从王宫直接送上断头台。

按照佞臣和内阁仓促策谋的计划，应当对所有为在国内造成普遍混乱的全部阴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在法国的帮助下整顿秩序，并为国家颁布一部温和的宪章，这部宪章会允许把它的制定者的权利和威信永远固定下来并使特权阶层倾向于新的制度。因此，与自由派秘密团体相对立，建立了温和派的秘密团体——圣友会，它的成员应当与内阁成员共同行动。他们慷慨地把大量金钱撒给了国王的私人近卫军，但当市警察局的代表把这件事告诉内阁时，后者嘲笑了他们，认为这个消息是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信号。驻扎在安达鲁西亚的国王的铁甲骑兵团被全部解散，在那些派有作为政治代理人的圣友会会员的各个省里，流传着令人担忧的消息。同时法官们接到密令从宽处理所有可能由他们进行法律判决的秘密阴谋。这些行动的的目的是要在马德里引起本应在瓦伦西亚发生的爆动。埃利奥将军是1814年的叛徒、后来又成为瓦伦西亚的俘虏，⁴¹他本应领导国家东部的反动势力。瓦伦西亚的警备部队总共只有一个团，非常效忠埃利奥，理所当然对宪法章程怀有仇恨的情绪。代表倍尔特朗·德·里斯在议会会议上恳求内阁把这些士兵调出瓦伦西亚，当内阁成员断然拒绝时，他提出了谴责政府行为的建议。叛乱定在5月的最后一天(1822年)——圣斐迪南日。这时王宫设在阿兰惠斯⁴²。按照信号近卫军的士兵们冲到街

上,并在阿兰惠斯平民们的支持下聚集在王宫门前,高呼:“我们至高无尚的帝王万岁!废除宪法!”。⁴³然而叛乱马上就被赛亚斯⁴⁴将军镇压了。瓦伦西亚团队同时爆发的暴动,在同警察进行流血战斗后也没有取得成功。叛乱在阿兰惠斯和瓦伦西亚的失败使自由派变得凶狠了。所有党派都在准备自卫,群情激昂。只有大臣们在这场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的混乱中,始终表现为消极的旁观者。⁴⁵

注 释

- 1 德·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3—34、37页。
弗朗斯瓦·勒奈·德·沙多勃利昂子爵(1768—1848年)——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 2 指的是西班牙议会1812年3月19日在卡迪斯通过的“卡迪斯宪法”。1808—1814年西班牙革命失败后,此宪法于1814年被废除,1820年1月1日被拉斐尔·德·里埃哥-伊-努涅斯(见篇末注18)恢复,1823年10月1日再次被废除。第三次实行是从1836年8月12日至1837年6月18日,之后又颁布了新宪法。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一篇专门分析了1812年的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89—498页)。
- 3 法国立宪会议通过的1791年宪法,在国内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授予国王全部权力及否决权。1792年8月10日由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进军它被取消。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确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资产阶级专制制度。
- 4 这个定义与西班牙专制君主制的特征相近。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的第一篇文章中指出:“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2页)。
- 5 斐迪南七世是西班牙国王(1808、1814—1833年)。
- 6 指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年)。
- 7 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1793—1879年)——西班牙将军、政治活动家

及进步党领袖。在第三次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34—1843年)为西班牙摄政王(1840—1843年)。由于向反革命献媚使他的政策彻底垮台,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往英国。第四次西班牙革命时期(1854—1856年)为政府首脑。马克思为此曾专门写了《埃斯帕特罗》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01—408页)。

- 8 一批著名的1808—1814年革命的参加者进入了1820年取得政权的内阁当中。他们是埃瓦里斯托·佩雷斯·德·卡斯特罗,曼努埃尔·加尔西里·埃雷罗斯,奥古斯丁·阿尔奎列斯,霍塞·阿尔奎列斯及其他一些人。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 9 1820—1823年革命时期,西班牙出现了许多民主俱乐部和秘密团体。其中的西班牙康姆尼罗斯联盟最为激进,它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康姆尼罗斯是支持同反革命进行最坚决斗争的一些拥护者。革命被镇压后,他们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并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 10 西班牙的地方自治机关在西班牙为推翻阿拉伯人统治而斗争的雷吉克斯达时期(公元八——十五世纪)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所在地是雷吉克斯达。
- 11 马克思根据自己对H·W·达维斯《十九世纪奥穆兹德和阿里曼的战争》一书所作的摘录引用了1820年7月9日斐迪南七世的话。
- 12 斐迪南七世于1808年5月放弃王位,从1808—1814年3月侨居法国。
- 13 指斐迪南七世与法国政府就有关他返回西班牙的条件所进行的谈判。1813年12月11日谈判以签定一项协议而结束。同年12月15日,约瑟夫·波拿巴(1808年以后的西班牙国王)放弃王位,从而对斐迪南七世十分有利。而1813年12月11日签订的协议条件并没有被西班牙摄政王委员会所履行。
- 14 马松阁是巴黎土伊勒里宫里的建筑之一,在1815—1830年复辟时期,是1824年成为国王查理十世的阿尔图尔伯爵沙尔-菲利浦的府邸。
- 15 根据斐迪南七世1823年9月30日颁布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因政治信仰和过去的行为而遭受迫害。然而国王从10月1日起就开始了1812年宪法的拥护者进行迫害。几乎所有的议会及政府成员都被迫迁居国外。这些资料马克思引自自己的读书摘录。
- 16 即巴达霍斯要塞,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民族自由战争中发生过多次残酷的战斗。